

# 从历史角度比较闽台海洋文化的发展

□ 陈 思

**摘 要:** 闽台海洋文化同出一源,可以说台湾海洋文化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但是闽台两地的海洋文化传统的发展历程却有着各自的特点。福建海洋文化成为当地的传统主流,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发展历程,而台湾海洋文化作为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在台湾获得了飞跃式的快速发展。这是由双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条件所决定的。

**关键词:** 福建;台湾;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95.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402(2012)03-0097-05

## 一、福建海洋文化是历史悠久的土生传统文化

福建地区的海洋文化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闽越族,他们生活在福建沿海地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sup>[1]</sup>是著名的海洋民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缔造者”。<sup>[2]</sup>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兵征服了闽越族,福建地区开始落入中原王朝的控制。此后,闽越族逐渐与迁入的汉人融合,但他们的海洋文化特点为融合后的民族所继承和发扬。

自唐宋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海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福建的泉州早在唐代就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更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著名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其游记中声称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sup>[3]</sup>到了明清时期,海上活动已经成为了福建南部如漳州、泉州等地区广大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泉州之后,月港、厦门港等新的对外贸易港口也先后兴起。当地的航海造船业同样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福建船厂生产的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昂首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中为四层”,“耐风涛,且御火”,<sup>[4]</sup>是当时著名的大型远洋船只。明代“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sup>[5]</sup>其下西洋时所率的船队当中,多有由福建所制造的大型海船。福建人利用这些船舶往来于海外各国之间,积极进行海上贸易,体现出了开放进取的海洋精神。在这一时期,福建人掀起了向海外移民发展的大潮,许多人常年飘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久而久之,便在当地定居下来。“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sup>[6]</sup>其在原籍之亲友也纷纷前往投靠谋生,逐渐形成了一处处闽人移民社会。为了对抗明清时期的海禁,许多福建人还结成海上武装集团,进行海外贸易和掠夺活动。

近代以来,福建仍然保持了牢固的海洋文化传统。鸦片战争后首批对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福州和厦门便包括其中,成为福建对外海洋交流的前沿。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驻福建领事馆在其报告中声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等地“出海谋生风气盛行,民众富于冒险精神”,<sup>[7]</sup>福建“移民之业

作者简介:陈思,男,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颇为兴盛,并对当地之通商贸易影响甚巨”。<sup>[8]</sup>而南洋福建移民的汇款,更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据悉,这类汇款每年在数百万美元以上。与南洋往来频繁的厦门人,其人数多达十万。”<sup>[9]</sup>

可以看出,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闽南人民建立起了跨区域的海洋文化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 二、台湾海洋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延伸

台湾岛上的原住民,约6000~6500年前便已在当地生活。有关他们的来源,学术界有“西来说”、“南来说”等不同看法。有的考证认为,他们其实也是百越族的一支。<sup>[10]</sup>但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百越族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居民逐渐向内陆平原和山区发展,转而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失去了原先的海洋特性。如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当明朝军队进入台湾清剿倭寇时,随军的学者陈第便发现当地原住民“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sup>[11]</sup>已经完全丧失了海洋文化传统。因此台湾海洋文化传统的建立,实际上是有赖于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大陆方面移民的作用。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等地的经济得到全面开发,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但到了明朝末期,当地的土地负荷已达极限,加之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向台湾移民成为了解决生计的重要手段。如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引发饥荒,为了安置大量灾民,福建巡抚熊文灿接受著名武装海商集团领袖郑芝龙的提议,“乃招饥民数万人……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sup>[12]</sup>在这一时期,台湾的海洋文化已经带有浓厚的福建海洋文化印记。当时在台湾经营海上贸易的商人,主要是以郑氏海商集团为首的福建大商人,其在台湾从事贸易活动更早于荷兰人。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驱逐了荷兰殖民者,随之组织福建军民大举迁入台湾。郑氏武装海商集团统治台湾期间,将当地建设成为了反抗清廷、经营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在郑氏占据台湾的时代,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依然是福建商人”<sup>[13]</sup>。这一时期的台湾海洋文化,可以说

是由福建海商集团所控制主导。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氏势力向清廷归降。两岸对抗局面结束后,通过各种方式前往台湾的大陆移民更是络绎不绝。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汉人数量已增加到190万人以上,相比荷据时代的约4.5万~5.7万人,<sup>[14]</sup>在不到两百年间剧增近40倍,其中十之七八都是福建地区的漳州、泉州籍移民。而同一时期台湾高山族原住民“不过15万人左右”。<sup>[15]</sup>大陆汉族移民、尤其是福建移民在台湾人口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带来的是社会文化的根本转型。两百年间,“随着移民大量迁入台湾,不仅促进了岛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以先住民为主的文化生态环境,闽南地区的民间文化很快就成为岛内的主流文化。”<sup>[16]</sup>台湾逐渐由土著社会变为以闽南文化为主体的汉人社会。同时,福建地区的海洋生活习俗和海神信仰也被移民带到了台湾,并在当地生根发芽。如起源于莆田湄洲岛的海神妈祖信仰便由渡台移民带过了海峡,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保护神。

从历史角度上看,可以说台湾的海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福建地区为主的中国大陆海洋文化传统的延伸和移植。“台湾的开发,是闽人海洋文化成就的展现。由于这一点也就在其开发之初,形成了台湾区域文化的特点——它是闽人海洋文化的延伸。”<sup>[17]</sup>

## 三、海洋文化在福建成为主流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福建和台湾地区的海洋文化传统虽然同出一源,但其发展历程却有着各自的特点。福建的海洋文化最终成为福建文化的传统主流,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福建本身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福建大部分地区属于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适合耕种的平原很少,这决定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有限。在早期当地人口稀少、粮食生产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农耕文化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居民的增加,福建的土地负荷已达

极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福建人民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他们所想到的,自然是在福建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海洋文化。他们积极进行海上贸易,将福建制造的手工艺品等物销往海外,以获取大额利润。“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自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钱财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sup>[18]</sup>有许多人前往海外,在异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由于海上活动作为谋生手段是如此的有利可图,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到了明朝中后期,它已经成为了福建当地的经济支柱和发展主导,“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sup>[19]</sup>同时以海为生、向海求富的思想也深深地渗入了广大民众的观念当中。清朝时期,甚至出现了漳、泉“两府人民原有三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sup>[20]</sup>的说法。这正是海洋文化逐渐从冷到热,最终发展成为福建地区主流文化过程的真实写照。

#### 四、海洋文化在福建的发展经历了与明清王朝政策长期抗争的过程

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进入明朝以后,统治者长期奉行消极的海洋政策,压制人民向海洋发展。明朝多次颁布海禁,号称“片板不许入海”,推行“仅准朝贡贸易”,禁绝国人出海贸易的闭关政策,<sup>[21]</sup>甚至连渔民出海捕鱼都不允许。福建更是成为了政策的重点限制对象。“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遂下令禁民间海船”。<sup>[22]</sup>福建地区管辖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由于所谓招引“倭患”的缘故,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遭到撤裁。朝廷的禁海政策,使得“民间海外贸易成为非法,扭曲了原来基本正常发展的海洋观念”。<sup>[23]</sup>这样艰难的外部环境,毫无疑问对福建海洋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然而,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或倒退,相反受到以海为生的福建人民的强烈反弹。不少人无视政府禁令,私自造船下海经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贸易。一些前往外国贸易

者如福建龙溪人丘弘敏等,甚至还“诈称朝使,谒见番王”<sup>[24]</sup>,令官府大为震怒。而福建的月港、浯屿、安海、铜山等地也因此而发展成为走私贸易的重要口岸。还有人干脆成立海上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进行海上贸易,乃至公开对抗官府军队。明朝各类史书中所记载的严启盛、郑芝龙、刘香等“海寇”,都是当时著名的闽人海上武装贸易集团。

在人民的强烈抵制之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终于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并在当地开征商税。福建人终于从官方手中争取到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正当权利。但是禁海与开海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清朝建立后,类似的情况再度上演,海禁政策历经几禁几弛,才于雍正五年(1727年)彻底废止。如此反复曲折,可知福建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之艰辛。

#### 五、海洋文化在台湾的迅速发展是以福建海洋文化的成就为基础

与福建不同,海洋文化在台湾很快就占据了重要地位。自荷据时代开始,在众多大陆移民涌入台湾之后,与当地的开发同步,海洋文化也迅速发展了起来。这种发展速度跟福建形成了鲜明反差。如前所述,福建的海洋文化最终发展为传统主流,是在陆地经长期开发已达极限之后的必然要求。但台湾作为新兴的开拓地,有着大量耕地可供开发,发展潜力十分巨大。按照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思维,台湾人民光凭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自给有余,本应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迫切需求。但现实却是在台湾的农业生产还方兴未艾的情况下,海洋文化就已经成为了台湾的主流文化,甚至连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在海洋文化的影响下商品经济化,将生产出的大量粮食、糖、茶叶等农副产品用于海上贸易输出。这样的飞跃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前面介绍过,台湾的海洋文化实际上是福建海洋文化传统的移植。当福建海洋文化被移植到台湾时,已经是得到了高度发展、扎根于福建移民们心中的成熟文化。因此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可以跳过传统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就享受



到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成果。而当时中国大陆福建等地海洋文化的发达,也为台湾方面走向海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福建等地的海上贸易集团足迹遍布东亚、东南亚,加之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他们的活动打破了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制的垄断,在中国、日本、南洋诸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东亚海洋贸易体系。台湾地方产粮丰富,但“比之大陆开发较久的经济区而言,当地手工业不够发达”,<sup>[25]</sup>因此对手工业品有着很大的需求,这与福建经济之间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而台湾作为联系南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中转岛屿,其交通地理位置更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因此将台湾发展成为海洋贸易的重要据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国的共同需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追随中国大陆的步伐,被拉入到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之中,与福建等地建立密切的海上贸易联系,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 六、海洋文化在台湾的迅速发展受益于当地统治者政策的大力推动

台湾方面海洋文化能够得到飞速发展,还要归因于当地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入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是以海上贸易而闻名于世的民族,号称“海上马车夫”。他们占领台湾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一个便于进行海上贸易的据点,以“打开对中国贸易问题的症结”。<sup>[26]</sup>所以当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确立统治后,便充分利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行海洋贸易,这与明朝政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荷兰人“一向用中国帆船把现款从大员和福尔摩沙运到漳州港口的厦门,交给驻在那边的代理人,有时交给可靠的私商,让他们购买适合于日本、东印度或我国市场需要的商品。”<sup>[27]</sup>然后将这些廉价商品运往各地市场销售,以获取大额利润。他们还采取措施吸引中国大陆商人运载货物前往大员,“不管是在大员、巴达维亚,或者是从大员航往广南、柬埔寨、暹罗和北大年的商人,凡是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中国人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sup>[28]</sup>这些措施无疑推动了台湾海洋文化的发展。

清康熙元年(1662年),荷兰殖民者为郑成功所逐。台湾进入了郑氏政权统治时期。作为台湾

新的统治者,郑氏政权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武力,而恰恰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新的历史动力——海上贸易”。<sup>[29]</sup>早在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时期,郑氏武装海商集团就已经活跃于海上。明朝政府征剿无功,最后对郑芝龙采取招抚政策,封以官职,默许其进行海上贸易。于是郑芝龙的势力发展更加迅速,逐步平定了其他海上力量,成为中国的海洋霸主。“初芝龙驻安平,自为坚舰,贸易于南洋群岛。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sup>[30]</sup>荷兰统治台湾时期,与中国大陆发展海上贸易也要仰仗郑氏的合作。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接管了郑氏武装海商集团,与清廷相对抗。为了维持反清战争所需的巨额财政开销,尤其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郑成功于收复台湾后不久病逝,其子郑经延续了他的政策,在福建厦门、东山等地设立贸易据点,收购大陆物品供应台湾,同时还将台湾所产米粮“供给漳、泉,以获其利”。<sup>[31]</sup>此外郑氏政权还极力吸引海外商人前来台湾贸易,其与英国签订的通商协议规定:“台湾王所买之货物,不付关税。”<sup>[32]</sup>并对来台外商以盛大款待。由于郑氏政权对海上贸易的重视,台湾出现了商人云集、贸易兴盛的局面,与众多国家都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如能与台湾通商,即犹如直接与中国、日本及马尼拉通商也”,<sup>[33]</sup>可以说已成为了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郑氏政权能“以弹丸之岛,而养七十二镇之兵”,<sup>[34]</sup>与大陆清廷对抗长达20余年,所依靠的正是从海上贸易中所获得的巨大利润的支持。

荷兰统治者与郑氏政权开放海洋的政策,为台湾的海洋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其飞速发展。荷郑时代的海洋印记,深深地铭刻在了台湾文化当中,为其定下了海洋发展的基调。

清廷出于大陆王朝重陆轻海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海洋的态度偏于消极。虽然清廷在台湾归服后逐步解除了海禁政策,但总体上对台湾海洋的开放依旧有限。即使是那些对台湾的重要性有所认识的清朝官员,多半也只是从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sup>[35]</sup>之类的海防战略地位角度着

眼,而很少涉及台湾作为东亚海洋贸易重要据点的意义。因此清廷统治时期台湾的海洋发展,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以闽籍郊商为首的民间势力以及近代开港贸易后进入台湾的西方商业资本的推动。荷郑时代以来由官方支持主导台湾海洋发展的状况,到此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台湾的海洋文化与福建海洋文化同出一源,可以说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但是台湾与福建地区的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却有着各自的特点。福建海洋文化发展成为传统主流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由于统治者政策的限制,它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发展历程。台湾海洋文化作为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是建立在后者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跳过后者之前所经历过的阶段,获得飞跃式的发展。台湾走向海洋发展的道路,也是建立东亚海洋体系的要求。而台湾早期统治者实行相对开明的海洋政策,同样为当地发展海洋文化铺平了道路。台湾相比福建在内外条件上的优势,使得台湾的海洋文化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东亚海洋文化的新兴力量。

注释:

- [1]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外传,纪地传第十,岳麓书社(长沙),1996年,第123页。
- [2]陈国强、郑梦星:《闽台古代海洋文化的主人》,《台湾源流》第17期,2000年。
- [3][意大利]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八十二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
- [4]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九十二,志第六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
- [5][20]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两百七十一,卷五十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68年。
- [6][19]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卷四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5年。
- [7][9]《福建省事情》,第62页,第4页,转引自[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9年,第337,323页。
- [8]《通商汇纂》,明治39年第34、35号。转引自[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9年,第325页。
- [10]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 [11]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4年。
- [12]黄宗羲:《赐姓始末》,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5年。
- [13][17][25]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第315,124,161页。
- [14]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33页。
- [15]周文顺:《台陆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1年,第238页。
- [16]杨彦杰:《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18]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5年,第55页。
- [21]曹永和:《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台北),1984年,第70页。
- [22]《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
- [23]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江西高校出版社(南昌),1999年,第113页。
- [24]《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七,成化七年十月乙酉。
- [26]村上直次郎:《热兰遮城筑城始末》(石万寿译),《台湾文献》第26卷,1975年。
- [27]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2年,第105页。
- [28]村上直次郎原译:《巴达维亚城日记》(郭辉译)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70年。
- [29]余英时:《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天下编辑:《发现台湾》序言,天下杂志(台北),1992年。
- [30]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五,商务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6年。
- [31]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粮运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6年。
- [32]赖永祥、曹永和编:《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台湾银行(台北),1959年。
- [33]赖永祥:《郑英通商略史》,《台湾风物》,第4卷第4期,1954年。
- [3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五,商务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6年。
- [35]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靖海纪事》卷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3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安然)